



斯图亚特·霍尔,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1958年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1964—1979年为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于格罗斯伯格而言,霍尔亦师亦友。图为在格罗斯伯格的婚礼上,霍尔与他的妻子在交谈。

◀ (上接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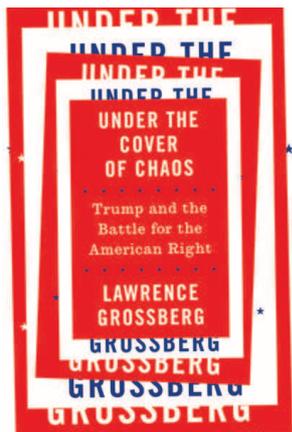
悲观。对于我们这些依赖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但在文章的最后,您的态度似乎仍是乐观的,为什么?作为左翼学者,在当前的语境下,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临走前的霍尔是悲观的,正如他对许多人说的那样,他根本没有看到前进的方向。但如果我们不以更复杂的方式理解他的悲观主义,对他所做的评价就会有失公允。我深信,霍尔的悲观主义不完全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他看到了它们的胜利总是有限的和矛盾的,仍然是一个不能保证结果的斗争。那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悲观的根源?我认为答案在于他对“左派”的判断,西方左派太过于无能以至于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反抗和转型的组织形式。他并不认为答案只是从过去斗争的碎片中汲取,而是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战略性的分析。尽管霍尔对世界的诊断是悲观的,但他从不放弃思考,他从未放弃过任何分散、临时和脆弱的希望,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从不停止与那些和他意见不合的人进行对话(如他称之为“新后现代主义者”的内在性、情感、自治等理论)。

但在今天,我们左派放弃了思考,我们总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个世界,总以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再思考。这是文化研究要反对的,也是为什么它那么困难也流行不起来的原因,因为它一直在试图“唱反

调”,告诉人们你正在做的不是真正的思考。比如说,创造概念,它真的能够解释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吗?世界总是千变万化,这个理论可能今天适用,明天就不适用,但承认自己错了并没有什么好羞耻。

今天,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们很容易说自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但这种“悲观”不应该是基于理所当然的假设和判断,而是基于严格的知识的生产。霍尔在他的著作中曾谈及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他身体力行地用自己一生中的每分每秒为构建知识与政治间的关系作贡献。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将是一个美好的启示:好的知识就是把现实“语境化”,承认矛盾和复杂性,并学会如何与之相伴,不知疲倦地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更好的故事,使人们能够更有效、更富有想象力地理解当下并重塑未来,共同致力于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隐藏的混乱之下:特朗普和美国右派的战斗》,Pluto Press,2018

“对尊严的热望” ——福山论身份政治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后,思想家们纷纷致力解释这一分崩离析的世界图景。在这混乱的顶峰,大家相信,现在西方世界不单有深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面临深重的哲学危机。

当前的时代症候是“身份政治”——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这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一度因“历史终结论”声名大噪,但也始终不能摆脱对这一失败预言的修正再修正。近日,他推出新著《身份》(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并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反对身份政治”一文,指出身份政治的兴起可以归因于社会对个人尊严的忽视或侵夺,宏大公共议题的缺乏则推动个体经验走向前台。原先弱势群体要求的“平等对待”更进一步为要求“特殊对待”,群体与群体的诉求之间日渐缺乏公约数。西方右翼更是套用了左翼为弱势群体伸张权利的话语,激化社会矛盾。

如何治愈被身份政治撕裂的社会?福山认为,还是要依靠国家。虽然西方左翼早已抛弃国族认同,右翼则将其扭曲、为种族主义服务,但国家仍然是团结人民、给予人民以目的感的最佳旗号。福山呼吁回归国家服务、重张为国效力的精神,同时质疑双重国籍。他认为,基于信条的国族认同,要比基于种族或传统的认同更牢靠。

《文汇报》在此择要介绍福山的“反对身份政治”。

一个能解释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

过去谈论政治,多从经济或意识形态角度作解,今天则是用“身份”。许多国家的左翼已经不再关注创造更广大的经济平等,而是致力于促进一众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和LGBT群体的权益。右翼则是为保卫传统的国族认同而战。

身份政治已经不再只是在大学校园里小打小闹的现象,不再只是媒体推动的“文化大战”中的背景道具。身份政治已经演化为一个能够解释全球事务的重要概念。一次又一次,各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认可。而政治领导人也利用了这一点,给追随者们作动员——你们的尊严正在被挑战,但值得被恢复。

全球化令社会更加多元,涌现更多差异化的群体。这些群体过去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今天则希望获得尊重和承认。但其他群体担心对他们的承认会令自己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社会由此变得更加碎片化,集体行动更加困难。福山认为,这是一条不归路,除非这些社会能够对人类尊严生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解,否则世界将会因此陷入持续冲突。

“对尊严的热望”与一种叙事的流行

福山还是从他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中提出过的“对尊严的热望”讲起。他认为这个古典哲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概念,一直以来被西方政治思想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所忽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thymos是“对尊严的热望”(the craving for dignity,或称“激情”[passion]),和“欲望”(desiring part)、“理性”(calculating part)一起,构成了人类灵魂。不过,thymos在英译中作“精神”(spirit),这位本科拿古典学学位的政治学家认为对应得不知所云。

在政治里,thymos以两种形式表达,福山也为此发明了两个单词。一是 megalothymia:渴望被认为高人一等。过去的社会多建立在严苛的等级制度之上,过去的人们也认为,某一阶层代代相传的优越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如世袭的贵族皇族。一是 isothymia:渴望被认为和每个人一样。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 isothymia 对 megalothymia 的胜利:只认可一小部分精英的权的社会,被认同每个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所取代。20世纪,阶级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开始寻求独立。美国政治史上对奴隶解放、劳工权利、妇女平等的追

求,就是权利一圈圈向外扩大,令得更多人被承认为一个完全的人类个体的过程。

福山这两个书生气的概念,在今天以“身份”的新衣,重回人们的视野。人们发现,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针对许多群体的歧视持续存在。尽管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财富总量令人称羨,但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现象激增,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经受收入停滞,社会地位下滑。

而那种“没被看见”的感觉,或许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也把英国投票送出欧盟的关键。害怕丧失中产阶级地位的人们,愤怒地指责精英,认为精英阶层完全忽视了他们,同时也怪罪下层穷人,认为这些人反而受到不公正的优待。他们一直相信,努力工作就值得被赋予个人尊严。

收入与地位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相较于因经济阶层而团结的传统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保守主义者在今天更能一呼百应。民族主义者告诉那些“没被看见”的人们,他们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那些外国人、移民和精英在合谋把他们拉下马:“你的国家不再是你的了,你在自己的国度没有被尊敬。”

这种叙事的流行,也是为什么移民在那么多国家都如此有争议。移民(人口的流动)和

(下转5版) ➔